

土民、客人与乡绅：万历至乾隆的黄姚社会^①

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 麦思杰

内容摘要：

明清时期是府江流域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导致这一变革的关键因素为万历府江僮乱的平定与清初客人的进入。本文以府江流域昭平县黄姚街为中心，将该社区的构建至于区域变动的大背景下展开讨论。力图理解在此过程中，土民、客人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如何透过祭祀系统的变革、祖先故事的重述确立其在区域内的地位。

关键词：明清时期 黄姚 社会

引 言

万历以降，广西府江^②流域社会经历了数次重大变革。万历府江僮乱平定以后，朝廷增设昭平县，在地方社会推行土司制度，以此逐步将地方社会整合至王朝的权力体系中。此后，随着明帝国的衰落，土司制度随之崩溃，地方社会重新进入到自治的状态。康熙三十年以后，清政府逐步取得了对府江流域的控制。在此过程中，大量客人进入当地，地方社会由此发生重大变动。至乾隆中期，社会秩序的重建大体完成，并奠定了清中叶至民国的社会格局。囿于资料所限，以往学术界对府江流域这一历史过程并无深入细致的讨论。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昭平县黄姚镇黄姚街进行野调查并收集到了大量碑刻文献与口述资料，其中包括数通顺治至乾隆早期的碑刻。在整个府江流域乃至广西其他地方，在一个村落内能找到如此丰富文献的情形并不多见。本文力图在官府文献与田野资料结合的基础上，重构黄姚街万历初年至清中叶变革的过程，以期对府江中游社会在明清时期的变革有一了解。

一、黄姚街概况

1. 地理及建制沿革

黄姚街位于昭平县城东北方的姚江边上，距县城 70 公里。姚江为府江重要支流马江的上游。明清时期，黄姚为昭平东北区两道交汇之冲，其一道由北而南

^① 本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项目“重构西江：明清帝国的建构与土著社会的演变”（编号：CUHK1/06C）资助。

^② 府江一般意义上指桂林至梧州之间的河段。

顺姚江下马江再入府江，二道由东向西走陆路经接米岭、马鞍山达西坪，再沿思
懃江抵昭平县城。第一条路为商业通道，第二条路则是万历以后文化里、宁化里
①、招贤里、二五都赴县城缴纳赋税必经之路。黄姚见于文献，始于清代，在明
代以前，并无黄姚的相关记载。②

黄姚街在清代隶属宁化里，宁化里北为见龙里，西为招贤里，南为文化里、
二五都。以上数里在地理空间上同属黄姚盆地，黄姚街位于盆地中央。一般认为，
黄姚盆地主要指的是宁、文、招三里。清光绪戊戌年(1898)，昭平县按照赋税的
征收将县辖范围划分了四大区，“凝化、文化、招贤三里及见龙里之五指峰门冷
水等村、上五都之凤栗洞、罗孟洞、冲表洞为关字区。”③清代以来，黄姚街一直
是整个盆地的市场中心地，区内的其它墟市如巩桥墟、界塘墟、公会墟错落分布
于黄姚四周，墟期错接有序，而黄姚街则每日为市。

2.宗族与祭祀系统

黄姚街由九条街道组成：中兴街（又称老街）、天然街、新兴街、鲤鱼街、
金德街、迎秀街、连理街、龙畔街、山磅街等。中兴街是黄姚最老的街道，其它
街道的设立与发展均迟于中兴街。街内的居民主要有八大姓氏：林、莫、梁、黄、
古、劳、吴、麦。除麦姓外，每姓在街内均建有宗祠（麦氏宗祠在钟山），马江
流域内同姓各支祖先牌位均放其内。莫姓、古姓支系较多，其中鼎元公支与天佑
公支另有祠堂，曰仙山公祠、天佑公祠。

① 另一称法为凝化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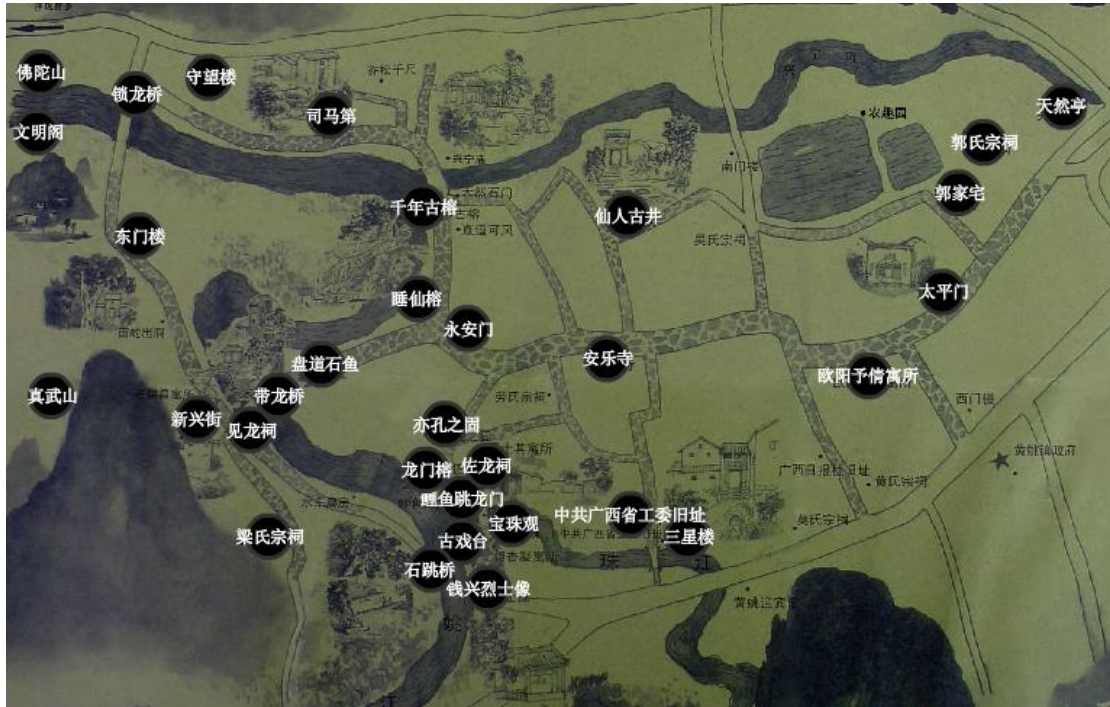
② 时称黄窑营，参见（明）杨芳：《殿粤要纂》卷2《昭平县图》，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页。

③ 民国《昭平县志》卷三，《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黄姚街社区示意图

< —— 南

北 —— >



黄姚街的祭祀系统主要包括一观、五祠。一观为宝珠观，内祀如来、观音、北帝^①。宝珠观为黄姚街内地位最高的宗教场所，其自万历创建以来数次重修皆由官府与黄姚的乡绅联合倡修。观内存有二十多通乾隆早年至民国时期的碑刻，其内容既有宝珠观的历次重修、乡民向观捐赠田产，也涉及到地方乡绅与官员联合倡修黄姚街往县城道路。碑刻涉及的内容清楚显示了宝珠观在整个黄姚盆地内的地位。观内现存最早的碑文为乾隆十三年《重修宝珠观碑》、乾隆三十年的古培修建码头捐款碑以及乾隆五十五年的莫家成捐款修路碑（内容在下文抄录分析）。宝珠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一直由僧人打理主持，彼时观内有许多的佛教仪式与活动。而观内另一主神——北帝的诞期为农历三月三，街内的七大宗族在这一天组织北帝巡游，这是黄姚街每年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之一。这一仪式是完全是按照道教礼仪的方式运作。^②不难看出，宝珠观两个神明背后分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宗教传统，一方面其是佛教的寺庙，而当作为地方民众庆典仪式的表演场所时，其遵循的是帝国时期正统的官方礼仪。囿于材料所限，我们不能清楚知道这两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但根据清代宝珠观重修时的碑文，我们猜测，宝珠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2。

^② 根据梁有钻等数位老人口述综合整理而成。

观极有可能在万历之前已经存在，但其只是一座佛教庙宇。明清变革之际，随着大量客人到此经商，随后在此建立北帝信仰。

黄姚街五祠指现存的安乐祠、兴宁祠、见龙祠、佐龙祠与福德祠。^①每祠分属不同的街道，各有自己的醮会，醮会由其所辖街内的民众组成。每遇大事，各祠便会打醮祈福，同时亦会邀他祠的神明或土地前往。在祭祀的仪式上，我们可以清晰分辨出“祠”背后所体现出的是黄姚社区内的空间格局。需要指出的是，在建筑的风格上，安乐祠与其它四祠有着明显的差异。安乐祠祀明代千户李道清，建筑为庙宇结构，而其它四祠的建筑结构为有背墙的亭子。在祭祀仪式的对象上，安乐祠、兴宁庙又与其他三祠存在明显的差异。兴宁庙祀真武北帝，其余均祀土地。从规格及各祠现存的碑文看，五祠应由由社演变而来。^②从祭祀的对象上看，安乐祠与兴宁庙显示出了与其他三祠之间的微妙差异。兴宁庙在五祠之中的地位最高。五祠现存有十数通碑文。在这些碑文之中，以安乐祠的碑文时间最早，分别为顺治十年与康熙四十三年。

事实上，黄姚街的祭祀系统十分复杂，涉及的问题相当多，此处无法一一细述。本文只是根据讨论所涉内容，以宝珠观与安乐祠为线索展开论述。

二、府江僮乱与昭平设县

讨论明清时期的黄姚社会，必先要对其所属之昭平县建置有一了解。昭平设县于万历元年（1573），其直接原因为隆庆间的府江僮乱。嘉靖年间，明政府平定大藤峡瑶乱后，遂将政治焦点转移至桂东地区的府江流域。府江为粤西至湘南的重要盐道，政府希望透过打通府江盐道以解决军事财政问题。控制航道首要之务乃是将沿岸“瑶僮”纳入版籍。隆庆初年，广西政府平定桂北地区的“古田僮乱”，取得了对府江北段区域的控制。^③之后，打通府江中段平乐府城至梧州府城之间航道，控制这一区域就显得尤为迫切。对此，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张翀在《平府江大功碑》中有清楚的表述：

唯府江猺獠当全省襟喉之会，由正德己卯以迄于今幾六十年矣！其间负固阻

^① 另有水口、大圣、福庆等祠，现已毁。

^② 如见龙祠《道光十年祠亭碑记》如是写道：“礼记云：‘先王立社必祭尊为土神。以其地能载万物，有功于民，所以神明乎，地道之大示不□本也，而德福土神均同功焉。’本坊有社与土主，创在明代。迺各姓先人自东徂西择□□所，而创业者其安居之后有曰：“同人□，□可无众家香火乎？”诸父老曰：‘然。’”，碑存黄姚新兴街见龙祠。

^③ 参见拙文：《“古田僮乱”与府江地域社会变迁》，《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2期。

塞，劫掠占据，使一州五县之内，行旅官民，田粮府库，受害有不可胜言者，虽仁人慈士，犹且奋臂，况以豪杰之才，总文武之寄者哉！^①

隆庆六年（1572），朝廷命“李锡以征蛮将军代俞大猷镇广西平乐”^②。军事行动很快取得胜利。随后，郭应聘上疏朝廷，议善后之策。郭应聘在《府江善后疏》中讨论的焦点是如何控制府江流域的僮人、瑶人。众策之中，郭应聘认为最当务之急乃是设立土司，用土司制度驾驭僮人：

一曰改设土司。夫欲弭盗，原先据要害。今荔浦之峰门、南源，修仁之丽壁市，永安之古眉各巡检司，皆久没于贼，宜悉革罢，易为土司……土司于兵领中择有才勇者，充其职事，俾世守焉！其不效者更置之。^③

上引材料所提及的土司，事实上包括两个来源：一是从他处征调前往府江流域镇压僮乱的土司，二是当地率先归附朝廷的僮酋。^④在此基础上，朝廷将土地分给土司，“拨令立土司，募兵领种”。^⑤因此，“改设土司”构成了昭平地区在万历以后社会变迁的起点。同时，为防止土司反复无常，明政府“更设参将”，“以整齐约束重示弹压也”^⑥。这一政治措施实际上与明政府以往在广西其它地区推广的土司制度有很大的差异。^⑦新设土司在军事上受到了明政府的强力弹压，更多只是承担募兵佃种的职能。由于军事上备受弹压，土司在无力对抗地方政府的同时，也使其权威在地方政治生活中极容易受到挑战。这一情况对昭平在明清之际的社会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为达至弹压土司与驾驭僮人的目的，郭应聘认为还必须创建县制与有效征收赋税：

^①（明）张翀：《平府江大功碑》，（清）汪森：《粤西文载》卷46，第三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页。

^②嘉庆《广西通志》卷199《前事略二十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6页。

^③（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8，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④（明）张翀在《平府江大功碑》中写道：“命下之日，公（郭应聘）遂调计兵食，发左右江之卒凡六万人……贼来迎战者，随戈而倒”，（清）汪森：《粤西文载》卷46，第三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页。

^⑤（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8，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⑥（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8，第一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⑦（明）田汝成在《论藤峡府江》中对两江、藤峡等地区的土司如是描述：“至于调发土官，往往方命不受节制，贼未及平而所过良民已受荼毒”，（清）汪森：《粤西文载》卷57，第四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4页。

五曰预定县治。府江距苍梧五百里许，中间山谷窈窕，林箐蔽藪，片影孤帆，行同异域。稽之故牒，唐宋昔设龙平、思勤、马江等数县，后胥为蛮占没，今昭平即龙平地也。江之西浒，广衍宽平，风气攸聚，宜即其地创一县治。以平乐之昭平、马江二里、富川之二五都、贺县之招贤乡上下半甲割而益之，总其赋得三千六百有奇，而仙回诸田税尽以属之。^①

在郭应聘的倡议下，“万历元年（1573），乃议城昭平，设县治理，复添设参将，开通水路诸道”^②，是为昭平建县之始。

但如果对昭平创县时管辖的地理范围稍加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上引材料所提到建制的区域，主要在府江沿岸如仙回、昭平、马江三里。这就意味着，在万历元年设县之初，政府对昭平县的主要控制范围还只是在府江两岸流域，控制的范围仍然缺乏纵深。而上引文提到从邻县划入的二五都与招贤乡则处于与富川、贺县交界的昭平县东境。这意味这在二五都、招贤乡与昭平里之间属黄姚盆地的广阔地区基本不在明政府的控制之内。如果对昭平县的地理状况再作了解，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地区是昭平县境内耕地最多的地方。建县伊始，地方官员考虑最多的自然是如何扩大版籍以增加税源，因此，耕地最多的黄姚地区自然就是官府政治的焦点。为此，官府不断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关于攻打黄姚盆地的军事行动，万恭的《平昭平山寇碑》中有以下的记述：

（万历）五年正月，克六勒诸巢，斩首四百级，俘贼属牛马器械称是。上四屯哨参将吴京以偏师十一月攻福村诸巢，克之；攻茅花大梁，又克之；攻五指岩，又大克之；十二月取铁钉岩，又取水穿诸岩；取黄竹二岩，又取牛棒岩，取大岗岩，又取白马岩，遂入五指二岩，乘胜又入五指三岩。正月穴地遂五指老巢，斩首六百级，俘贼属牛马器械称是。余贼悉奔溃四沸。有司土汉兵俘斩有差。露布以闻。圣心嘉悦，大中丞晋级一级，锡金币，余并加

^①（明）郭应聘：《府江善后议》，（清）汪森：《粤西文载》卷8《奏疏十一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②嘉庆《广西通志》卷199《前事略二十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23页。

升。^①

虽然上引材料没有出现黄姚的具体地名，但如果用乾隆《昭平县志》中提及的地名^②去核对以上地名，我们不难发现，所涉地名均属清代黄姚盆地的宁、文、招、见龙四里。进攻路线所涉地名显示，官兵由北而南收服黄姚盆地，军事行动的重点为五指岩“诸巢”^③。从巡抚杨芳在《殿粤要纂》中讨论如何打通赋税道路的情况看^④，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成功的。这意味着黄姚盆地在此次军事行动后成为了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材料中所提到的黄竹（即篁竹），是一个离黄姚只有数里之遥的村落。军事行动的路线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官府在行动以后取得了对黄姚地区的控制。同时，在黄姚街民众的历史记忆中，万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年份。在各种口述资料以及现存的祠观碑刻都认为黄姚街创建于万历初年。两类文献的互证，我们基本可以判断相信黄姚入籍的时间为万历初年。

三、李道清信仰与地域政治秩序

如果说上一部分讨论的是黄姚街入籍的时间与区域背景，那么这一部分讨论的则是黄姚街在入籍初期“改设土司”对其的影响。要了解这一情况，我们必须对官府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及府江流域的种落关系作一分析。

隆庆末年，明政府对府江流域用兵之初，广西兵备佥事茅坤对这一区域的社会结构与军事策略有以下论述：

而又以向道不审者，诸獠獞并阻山谷之险，悬崖飞栈，深林茂箐故也。

我师之侦者，既不得入，何以测彼已习向背，而覘缓急，于是别募死士为缉事军，且令各携善绘事者而入。夜行昼伏，分道深入。至则各图其山川道里以出，某贼巢为左，某贼巢为右，某巢枕某隘，某巢控某江，某巢与某巢相姻党，当别为行间；某巢与某巢相雠杀，可遣金钱使之相夹击，而其图又恐逡者之侦及也，以药笔傅之纸，绝无可覩见者，出则又按图别聚沙为山谷状，不二三月间，而府江所辖诸夷砦，其最狡且险者八十二处，稍次者亦不下百

^①（明）万恭：《平昭平山寇碑》，（清）汪森：《粤西文载》卷46，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1。

^③ 五指岩即五指山，在宁化里樊家上屯，乾隆《昭平县志》，卷2。

^④ 参见（明）杨芳：《殿粤要纂》卷2《昭平县图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余处，大略并如掌股间矣！^①

从茅坤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府江流域种类繁多，酋落众多，而酋落间关系错杂，或姻党，或讎杀。明政府的军事行动充分地利用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逐一击破，分化瓦解。万历五年明政府在黄姚盆地内军事行动的顺利推进，实质上是隆庆末年分化策略的延续。在此过程中，被分化并投靠官府的被封为了土司，而与官府对抗的，则成为史料中所记载的“贼”。这一分化重组的过程实为土司制度在府江流域以及黄姚盆地构建的社会基础。

在了解这一因素后，我们再以李道清信仰为中心作一细致考察。前文已述，安乐寺李道清信仰为街内最重要的信仰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奉祀李道清或与李道清相关的神明绝不止于黄姚街，如盆地北部的水岩村振都祠亦奉祀李道清。民国廿三年（1934），昭平县政府重修《昭平县志》，修志者在水岩村搜集到的李道清故事如下：

李道清，关区水岩村人。与黎宗远相友善。万历初，匪首黎天龙啸聚党类于五指山之岩洞，屢为民患。道清与宗远同心协力，集团防剿，历年余始。勘定之后，嗣念其功，塑像奉祀于振都祠。^②

今日水岩村内所流传的李道清故事与民国县志的记载亦大致相同。这一故事主要强调三点：一是李道清为当地土著，水岩村人；二是李道清与黎宗远之间的结盟关系；三是两人共同协助明政府在万历年间击败黎天龙。这一故事凸显的是万历初年年间在官兵在攻打黄姚盆地过程中不同部落的分化，李道清与黎宗远代表的是投靠明政府的酋落，而黎天龙代表的是与明政府对抗的酋落。勘定以后，李道清得到官府褒扬而成为正统神明，而黎天龙则被史书记载为“匪”。根据万历初年官兵的行军路线及水岩村处于盆地北部的地理位置，其极有可能是官府首先接触到的酋落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将水岩村的李道清故事与黄姚街的版本作一对比，便能理解黄姚街如何创立。乾隆《昭平县志》关于黄姚街李道清故事有以下记述：

小营，在宁化里黄姚埠。明末时獠獠猖獗，千户李道清率官兵扎营于此，

^①（明）茅坤：《府江纪事》，（清）汪森：《粤西文载》卷35，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9页。

^② 民国《昭平县志》卷5，《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页。

至今壁垒由依稀可见也。^①

材料中的黄姚埠即黄姚街。这段写于清乾隆的材料强调了以下几点：一、在黄姚街在明末的时候为兵营；二、李道清为外来的千户，非本地人氏；三、李道清被奉祀的原因为其平定明末猺獞之乱。与水岩村的故事相比，这一故事的时间记忆较为模糊，两者并非完全吻合，同时，黄姚街故事重点强调的是李道清平乱与创建黄姚的事迹，而不在于与其他酋落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乾隆《昭平县志》的修志者，即当时的县令陆焯在序言宣称所载故事均采集于地方乡绅耆老，而黄姚街的诸姓乡绅亦在协修者之列。^②这就是说，乾隆县志中所载的这段材料实为乾隆年间黄姚街内乡绅的声音。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黄姚街在材料中被称作“埠”，显示了乾隆年间黄姚街因商业的发展而成为了市场中心地。这一细节提示我们，李道清故事极有可能在清初因社会的变革而发生了改变。而民国《昭平县志》对于黄姚街安乐祠李道清的故事又有以下的记述：

安乐寺 在黄姚街中，清顺治间建。先是猺獞猖獗，千户李道清等率官兵讨平之，遂立此祠，故名安乐。^③

民国县志的版本大体上与乾隆县志的版本无异，都强调李道清平定猺獞之乱及创建黄姚的事迹，但不同的是，原本明末的时间表述变为顺治年间。现今黄姚街的民众亦认为“李道清是顺治年间的将军，时地方动乱，其率兵平定黄姚，民众从此安居乐业，至于李道清是何方人氏，则无从考究”。^④换言之，现在流传于黄姚街的版本大体与民国县志记载的版本大体相同。以上的分析告诉我们，李道清作为黄姚街民众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与黄姚街的创立及其在清代的变革紧密相连。

但如果我们暂且将黄姚街故事在清代的变迁放在一边，暂且不考虑其在清代的变化，而是试图把握其与万历初年黄姚盆地的社会变革之关系，考究黄姚街与水岩村的李道清故事的差异与联系就显得尤为必要。首先，水岩村强调李道清是该村的人士，而黄姚街则认为李道清是外来的千户（民众称其为李将军），同时有意无意地将李道清的籍贯隐去。在李道清的籍贯问题上，两地版本之间并不存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2。

^② 乾隆《昭平县志》，《姓氏》。

^③ 民国《昭平县志》卷2，《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④ 根据黄姚街梁有钻老人口述整理而成。

在矛盾。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黄姚街创建的合法性来源于外部。另外，上文已分析，李道清代表的是被官府立为土司的酋落。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判断，黄姚街奉祀李道清实为万历五年的军事行动的结果。官府由北而南收复黄姚盆地的过程中，盆地北边的酋落透过与官府的合作，取得了对黄姚街的控制，进而将李道清信仰移植至此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距黄姚街不远的篁竹在当时亦属李道清势力影响的范围。在前引材料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李道清在协助官府平定黎天龙匪乱的过程中得到了黎宗远的协助。而关于黎宗远其人，乾隆《昭平县志》中又以下记载：

黎宗远，关区篁竹村人，痒生。嗜文学，谙兵法。道清器重之，与之订金兰。道清剿灭黎天龙，宗远有运筹之功，宜处乎得配享于冯都庙。^①

显然，李道清故事在凝化里许多村落的信仰系统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神明及地方权威的正统性、合法性均与李道清有密切关系。这从另外一个层面揭示了在黄姚地区在万历军事行动以后推行土司制度的情况。

因此，黄姚街创立之初直接源于万历五年的军事行动与地方社会的分治。官府依靠李道清等酋落的帮助取得了对盆地军事行动的胜利。军事行动结束以后，为驾驭僮人，官府在包括黄姚在内的诸多要冲之地设立军营，改设土司。黄姚因隶属李道清土司而奉祀李道清。盆地内流传不同版本李道清故事与传说的背后，隐喻的是万历年间改设土司以后的政治格局。

四、明末清初：田产与社会变革

在讨论黄姚街在万历的建置背景及其体现的区域秩序后，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黄姚街民众入籍的情况及其土地制度。上文已述，官府征讨黄姚盆地的目的在于昭平设县后需将更多的民众纳入版籍以获得充足的赋税。因此，“改设土司”的核心在于如何招抚僮人以及如何向其征收赋税。关于对黄姚盆地赋税的征收，万历年间广西巡抚杨芳在《殿粤要纂》中如是写道：

由马鞍山、度米岭(即接米岭)以达思勳江，乃排民输赋至县城必经者，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7。

其岭道巉岿，极目宵翳，不可以无备也。^①

显然，设县以后，官府力图打通盆地往西通往县城的道路以确其对盆地的控制。需要指出的是，位于黄姚盆地西出孔道上的马鞍山、接米岭，其地理位置在明清两代一直因官府征收盆地赋税而重要。如民国《昭平县志》有以下描述：

马鞍山 在黄姚街北绵亘数百里岭南为宁化里，岭北则上五都。

接米岭 离县治近百余里，高数千仞，羊肠鸟道。尤险者曰马头，曰石碇，陡峭壁立，径路几绝。猺獞凭为渊藪，后文化、宁化、招贤诸里赴县输租，水陆纡回，途远数倍。钱兆沣捐俸开凿，化险为夷，往来便之。^②

由明而清，此路的数次重修亦正体现了黄姚盆地社会秩序的变动。从杨芳对马鞍山、接米岭的论述不难看出，万历大征以后，官府力图透过控制道路以确立这一地区的版籍。而控制赋税最重要的措施乃是改设土司过程中的“清理田产”。《万历武功录》对此有以下记载：

万历元年（1573），题准广西清出猺獞占据田土。除平乐、荔浦、永安原系民田，拨还耕种，办纳赋役外，其余俱拨令立土司，募兵领种，每兵给田十亩，其大小头目酌量加添，三年后方行升科，每亩止征米三升，一应差役悉行。^③

从上引材料不难看出，昭平境内的田地产权在万历以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动围绕着四类人展开的：一是占田的“猺獞”；二是原有户籍之民；三是承领土地的土司；四是领种耕地的军户。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土司与军户的关系。地方社会上原先的很多大小头人在军事平定的过程中被官府立为土司并开始募兵耕种。材料中所提及“募兵领种”的情况向我们暗示了这些军户并非异地征调而来，而极有可能是土司确立统治以后在当地招募的瑶人、僮人。官府在这一地区确立版籍的主要手段为将瑶人、僮人变为军户。

在了解这一背景后，我们不难把握黄姚街创建之初的居民来源。前文已述，

^①（明）杨芳：《殿粤要纂》卷2《昭平县图说》，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页。

^②民国《昭平县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③（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2《广西》，《中国野史集成》第26册，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76页。

黄姚街内现有七大宗族八大姓氏，根据其祖先故事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是明末因平定寇乱从广东迁徙而至；二是清初因经商从广东迁徙至此。^①前一类居民如吴姓、麦姓、莫姓的汴雄公支、绍举公支等，后一类居民如郭姓、古姓的天佑公支，莫姓的鼎元公支等。讲述自己祖先因平寇而定居此地的民众实际上就是黄姚开创之初的军户。如《麦氏族谱》中关于其先祖源流的叙述如下：

我始祖世居南京苏州，当奉调由南入粤剿平余寇。隋（随）征后代竟分居于南海、东莞、顺德各县立籍。未久，西江流域及四川等地苗寇作乱，必华公奉调四川，必达公出发西江，复回西江立籍。纪传等四代其中，散聚亦难详解。传至智德公，籍在东隅头，又传至应海公，以后林运公，由下帅而至贺县、桂岭，在必龙州中至□洞，后至鸭窝^②立籍。今恐怕年湮代远，后世子孙考序无征，以是立成斯谱，得以继而犯之，无失其真。自今以后，见本之根，见水之源，世系分明，井然不齐。读谱者尊祖敬宗，远者而近之，散者会聚之。序亲疏别长幼，思义之隆，礼法之盛，三代忠厚之遗，志庶其复兴子我麦氏之门弟。仁人孝子用心□后代之孙，昌识胜前人之称。盛开增修斯谱，亦当文献之征也。吾始祖姓岑名宿世籍金陵苏州人也，韬略过人，智勇兼全，能举鼎日行五百里，精通武艺善用铁棒，故名铁杖也。当年隋皇文帝诏至藩下，调兵亲至百越交趾，杀服黎夷各献图兴归顺统一，始建广州为广东省。然岑更为麦姓者，因我始祖隋（随）征平越时，缺粮饷，乃采麦接济，得立功臣，隋文帝钦赐麦姓，并功封宿国公为奕世，立功封爵，人安物阜繁忠臣孝子，世世相承也。^③

需要指出的是，族谱记述的迁居时间与街内民众的表述（包括麦姓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街内居民一致认为麦姓居民为明末迁居至此。而《吴氏族谱》对其

^① 综述黄姚街八姓族谱而成。

^② 笔者猜测，此处提及的鸭窝为乾隆《昭平县志》（卷）中提及隶属于土龙松柏营巡检司的鸭公营。

^③ 黄姚《麦氏族谱》，手抄本。

因平乱而迁居的故事表述更为清晰：

明万历年间，粤西昭平之北陀移民梗化，上命陈龙崖率师剿之。事平招良民承垦。我麒麟公奉叔祖命选北陀可安。^①

将以上两个故事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结构的相似性，其讲述的都是麦、吴两姓祖先如何开户立籍的故事。在其祖先来源上，均与平定贼寇密切联系。这两段材料从历史记忆的层面向我们揭示了这些民众的军户身份。因此，黄姚街最早的居民来源实为领地耕种的军户。万历确立版籍以后，各种史料均使用“民”、“僮”来标识黄姚盆地乃至昭平境内不同人群的身份。此类问题的标识实际上是建立在户籍的基础上：有户之民与无籍之徒。

囿于材料的散佚，我们无法得知黄姚街的军户在入籍之初领种及其与僮人关系的具体情况。但万历中叶以后，在昭平县的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持续数十年且影响深远的民僮田产争夺案。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对这一时期的田产状况以及民僮关系做一了解。田产案发生的原因，与土司募兵耕种有着密切的联系。^②万历末年的昭平县令柯寿恺在其修撰的《昭平县志》中有记录了以下一个案例：

黄姜水村有僮人王朝章者，先附吴天恩户下纳粮，续告出户自纳，（吴天恩）不知王朝章原实有僮田者也，乃僮奸。韦公信欲援为例，纠合群蛮将所佃三排民田认为己产，陈告立户办粮。不知万历廿六年大征之后，已奉抚按履亩踏勘，民田还民，僮田还僮，册籍炳据，而三排实系民田，且各有僮人租契可查，并建县时黄册昭然，则僮人之占民田了然矣。乃前任署知府不知何故，断应纳钱粮民僮各纳一年，而更以凌轹等字加杖良民，于是奸人得志，告扰不休矣。况奸讼一年则赚一年之租，攘为己有，近闻僮奸讼谋民田，投献藩邸及假造石碑埋藏地下。若今不扑灭，假令通县僮人效尤，则昭无民田矣！通省僮人效尤，则粤无民田矣！谁实质成而貽祸至此极耶？！节略。^③

^① 黄姚《吴氏家谱》，油印本，第10页。

^② 详细请参见拙文：《开户立籍与田产之争——以明清时期黄姚社会变迁为中心》，《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③ （明）柯寿恺：《夷情志》，见民国《昭平县志》卷7，《中国方志丛书》第1390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上引材料清晰地告诉了我们僮人被招抚的一些细节。许多僮人将自身的田产附至有户之人的名下，以此方式纳粮交税。而有户之人，实质上就是上文提及的土司或军户。在这一机制下，僮人向“民户”交纳租钱，而“民户”则代僮人向政府交纳赋税。在这“合作”模式中，僮人借“民户”之名获得了合法身份，而“民户”则获得了经济利益。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大征以后，地方社会仍存在着大量没有入籍的僮人，而官府则希望借助土司、军户招抚僮人。但这一制度实际上是推行了很短的时间，万历中期以后，这一制度渐趋于崩溃，实际占有田产的僮人实拒绝向名义上占有田产的“民户”交纳租赋。在此情况下，县令柯寿恺的前任再断“民田”，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各纳一年钱粮，这实质是认定“民户”与僮人各拥有一半的产权。这一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田产归属的纠纷，僮人与“民户”均希望完全占有田产，由是发生了万历末年的田产纠纷。这样的案例在明末的昭平县并非偶然事件，崇祯年间甚至还出现“民户”与僮人将官司打至朝廷，最后由崇祯皇帝断决的案件。^①僮人与民户的矛盾，实质上是土司、军户与无籍之徒在帝国版图确立过程中的矛盾。

如果对这个案件再作深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万历以后昭平县土司制度构建中存在的更深层问题。在大量僮人没有被整合至王朝权力体系的前提下，矛盾重重的田产案件所折射出的是官府与土司对地方社会控制的乏力与社会秩序的混乱。没有入籍的僮人因仍然控制着大量的田产。明帝国崩溃以后，这些纠纷以何种方式解决，在正史中并没有相关的记载。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并不难推断，激烈的纠纷意味着地方上拥有许多田产但没有户籍的豪强具备了与拥有户籍的土司、军户对抗的实力。而大明帝国的坍塌，使用土司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也就不能在名义上再对僮人的田产拥有所有权。土司制度崩溃以后，地方社会重新陷入到自治的状态。

在这一时期的田产纠纷案中，虽然没有相关史料让我们可以直接把握到黄姚街的情况，但安乐祠现存一块署年天运祭巳年（顺治十年 1653）的题名碑刻却可以让我们多少窥视到明末清初的土司制度瓦解以后黄姚街的一些情况。兹抄录全文如下：

各姓安居集福门内，始免危难。惟是沧桑世变，势非易卜。用集各百姓

^① 该案细节可参见乾隆《昭平县志》卷7。

耆老公同议定，所有前人永远掌管伙食、山场五处。概九甲内樵牧山场系各百姓子孙世守，诚恐土客杂处，日久湮没，无所考□，用泐诸石，以垂永久云。

计开

黄姚九甲山场出各恕列

石阑口 道洞龙冲 绿叶冲 山塘冲 山巢冲

耆老

古郭镇 梁云 伍苍碧 劳兴佐 宋贵寅 梁仕通 邓九锡 伍林绍 伍君厚 古

国邑 邹思保 陈悦亭 孟万贵 伍苍生 等全刊

天运祭巳年冬月吉旦同议于集福门^①

从碑文的内容看，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从碑刻修撰的时间看，顺治十年正是府江流域地区“不明不清”、社会动荡的时期，署年天运亦印证了地方正统权威的缺失。^②其次，从碑刻修撰的目的看，其主要记载顺治年间街内民众在担心在土客混杂的情况下以祖先的名义控制山场和田产。第二，从控产情况看，黄姚街此时为黄姚里，里有九甲，九甲只拥有五处山场。如果将其与乾隆以后黄姚街内的豪族相比，这一田产数量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此乃碑文表面所揭示的内容，但倘若将该文结合明末府江流域的历史背景展开分析，其蕴含的历史内涵更为丰富，其实质向我们揭示了土司制度崩溃以后地方社会的情形。首先，文中虽然没有提及到僮人，但却从另外一方面暗示我们，在不存在入籍问题的前提下，民僮矛盾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僮人极有可能已经重新确立了其对原有田产的控制。此外，前文中已述，黄姚街军户原属水岩村土司管治，其对田产控制的合法性来源于土司制度。明帝国瓦解以后，在土司无力控制地方社会的前提下，许多军户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透过祖先等文化符号的创造与运用以实现对其田产的控制，而这一情况又与明清鼎革之际大量客人、流民进入到这一地区耕作有密切关系。同时，此碑亦告诉我们黄姚街内的民众此时势力并不强大的事实。

^① 碑存于黄姚街安乐祠外墙。

^② 笔者猜测，昭平地区在此时期应当属李定国的控制范围。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万历至清初，黄姚社会经历了从土司制度构建到瓦解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黄姚街民众以军户的身份入籍并获得土地。而在整个昭平县的境内，官府希望透过土司、军户招抚僮人，但土司制度的缺陷，使这样招抚导致了地方社会因田产出现混乱。明帝国崩溃以后，地方由此进入到自治的状态，黄姚街民众亦只能透过各种方式控制自身田产。而此时大量客人开始进入至当地，又成为了黄姚及昭平社会变革另一个新的变量。

五、康熙入籍与宝珠观控制权的转移

清政府对昭平地区的统治大约建立于康熙三十年（1691）^①。此后，在重新确立版籍的过程中，地方文化随着权力秩序的变动而不断发生改变，这一变动过程至乾隆中叶基本完成。

康熙中后期，官府确立版籍之初，开始重新修通盆地经接米岭、马鞍山至县城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盆地内一些有地位的乡绅亦积极协修。如乾隆《昭平县志》中有这样一个例子：

黎中和，宁化里廩贡，任太平学博。当钱邑侯开接米岭时，中和赞助之功不少，生平好经史，尤工音律。训导太平极得诸生心，后以老辞职士子赋十怀诗以道依恋之情。^②

材料中提及的黎中和为宁化里黄竹人^③，而钱邑侯即康熙五十八年的知县钱兆沚。关于钱兆沚的事迹，《昭平县志》有如下记载：

钱兆沚，浙江长兴贡生，康熙五十八年任。凡城池公署祠宇修废，举堕身任其劳有捐俸开凿接米岭险道三十余里成坦途文宁招三里输将甚便。士民颂之，并于附城及黄姚、英家设立社学。^④

以上两段材料揭示了康熙末年黄姚地区的权力格局。黎中和积极参与官府赋役征收的事务，主动协助开通了接米岭赋道，表明了其经济实力及在盆地内的地位。协修道路实质是黎中和等乡绅需要借助官府的支持以维护其地位，同时官府亦需要此类乡绅协助征收赋税。我们或许可以猜测，黎姓是黄姚盆地内最早参加科举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8。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7。

^③ 黄竹《黎氏族谱》，手抄本。

^④ 乾隆《昭平县志》，卷7。

考试的家族之一，而其考试的目的又是与版籍的确立紧紧联系在一起。

直至乾隆初年，黄竹黎姓在黄姚一带仍让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其已为领导地位已逐步为黄姚街内日渐崛起的乡绅所取代。对此，我们可以考察宝珠观的变动情况。前文已述，宝珠观为黄姚地区的信仰中心，其控制权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黄姚地区权力秩序的变革。自万历至清，官府与地方精英数次联合重修该观。昭平县正堂周正培在嘉庆十七年（1812）的《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准提阁》中如记述嘉庆以前的数次重修：

宝珠观，在昭邑城东北之黄姚街。自前朝万历年间，越乱既久，渐就倾颓。

迨本朝康熙五十年，左近居民兴意重修，鳩工庇材，群起而力成之众盛举也。

①

从上文中可知，宝珠观建于万历年间，并在康熙五十年、嘉庆十七年、重修。此处有几点须加留意：首先，宝珠观兴建于万历初年，与明帝国在盆地建立统治的时间基本吻合；其次，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之际，宝珠观“渐就倾颓”；其三，宝珠观重建于康熙五十八年，正值清王朝控制昭平不久。宝珠观与帝国时间的大致配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宝珠观在区域范围内的正统地位。

宝珠观内现存最早的碑文为乾隆十三年（1748）的《重修宝珠观碑》。此碑原来有无重修碑文已无法考证，但所有捐款人的题名仍保存完好。兹抄录全部如下：

重修宝珠观碑

缘首 孟时英 举人黎兰光 助银壹两

信生 黎绵光 七钱

信士 孟德济 □钱

孟时明 五钱

陆国升 四钱

信士 梁儒惠 三钱

① 《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准提阁》，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信生) 黎焕 三钱

潘成宗 三钱

黎千忠 三钱

邓以梧 三钱

信士 冯张天 三钱

成大任 三钱

周士騫 二钱

董元正 二钱

董元棋 二钱

信士 李广朝 潘能□ 梁李魁 黄秀文 梁彩高

各助银二钱

信士 □君立 二钱

梁修清 二钱

陈过乡 二钱

覃寄安 二钱

朱勤叶 二钱

缘首 梁可祚 男元荣 魁荣 共银六两九钱正

缘首 严国谦

从缘募化信士张朝统交助资钱二千二百五十六文

信士 李子瑞 二两

陈禹统 五钱

信生 莫则予 陈禹纪

信士 钱金字 梁秉华 宋经彬

各助银三钱正

信士 梁天柱 二钱正

陈麟祥 欧阳□珠 苏瑞宁 莫侍□ 李维本

各助银一钱

信士 黎振都 二钱

黎金俊 二钱

黄题裔 唐义明 唐义睿 陈国圣

各一钱五分

信士 张舒华 一钱五分

周昌瑞 冯昌议 苏道魁 许汝求 岑宪乐 梁超衡

各助银一钱正

信士 梁超术 梁超德 黄□□

各银一钱

本观主持憎耀光、慧正师徒普照

乾隆十三年戊辰岁秋谷日立^①

碑中的捐款人数不多但较杂，缘首之一为黄竹人黎兰光。^②由此可见，至乾隆前期，黄竹黎姓在这一地区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但若再注意到题名中的其他捐款人，我们发现了黄姚地区此时出现了一些变化。黄姚街内的民众如梁可祚、梁李魁、莫则予^③等人亦在捐款之列，并且有着较高的地位。这一碑刻微妙地揭示了街内民众开始进入宝珠观的权力核心，宁、文、招三里权力格局变动的过程。对此，我们在讨论宝珠观必须要考虑到，其现存最早的碑刻是乾隆十三年，之前

^① 《重修宝珠观碑》，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② 黄竹《黎氏族谱》，手抄本。

^③ 黄姚《梁氏族谱》，手抄本。

的碑刻为何没有被保存下来？在考虑到乾隆中期以后宝珠观一直为黄姚街乡绅控制的因索，我们或者可以反过来推断，这一碑刻是黄姚街民众开始借助宝珠观介入及控制黄姚地区公共事务的开始，之前的碑刻没有保存下来的原因在于彼时的宝珠观并非由街内乡绅控制。因此，乾隆十三年碑刻在反映宝珠观控制权变动的同时，亦揭示了黄姚地区从康熙中后期至乾隆早期社会权力秩序的变动。

乾隆以后，宝珠观的控制权逐步落入至黄姚街内乡绅手中。乾隆以后的数次重修，捐款均以黄姚街内居民为主，而临近居民为次。^①此后，街内乡绅不断以捐赠祀田为手段以维护其对观的控制。观内现存有大量祀田碑记，兹举一例以作说明：

窃惟 寺观鸟革□飞，祥映三千法界；登明香馥，恩敷亿万生灵。兹当
庙宇落成，祀田犹少，诚恐松膏不继，云堂乏出。焕之仪安得桂魄？常感福
地尽琉璃之境，爰是信士莫启祥偕继室李氏、妾覃氏、男韬旬发善心，将躬
下买受断业田用价一十三千五百文正，系文化里六排周正户官田二亩五分，
上官粮银二钱五分正，土名座落见肚垅边处田一坵，共三坵，已经投税炳据，
敬入宝珠观。主持僧递年收租纳粮，永远供奉香灯。每月朔诣 观拜佛，参 神
庶。 紫竹林中佛士之日轮永照 大雄殿上金容之满常辉。朗徹三乘，福庇
一家。謹镌石以志不朽。是为记。

嘉庆十九年暮春三月谷旦立^②

此碑为莫启祥向宝珠观捐赠祀田的碑刻。值得注意的是，莫启祥捐赠的田产位于文化里，表明其田产分布范围相当宽。正是由于街内乡绅不断向宝珠观捐赠祀田，宝珠观的经济实力日趋雄厚，从清中期至民国阶段，宝珠观一直因其拥有大量祀田而成为了昭平境内府江西岸的第一大观。

六、神明、科举与大族的兴起

在了解到宝珠观所体现出的社会秩序变动后，我们不妨再将眼光转回到黄

^① 此情形在现存于观内的《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准提阁》、《光绪二十年甲午重修宝珠观壁背并通宝珠山碑》等碑的捐款名列中有清晰体现。

^② 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姚街内，讨论其街内社区在这一时期如何变动。从康熙末年至乾隆初年，黄姚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客人的进入并导致了社区人群构成的改变；二、大族崛起由此文风蔚然，黄姚街成为了盆地内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

这一变化过程首先体现在安乐祠及李道清故事的改变。安乐祠现存有一通康熙四十三年《重修安乐祠碑记》。兹摘抄部分碑文如下：

重修安乐祠碑记

尝谓人生斯世，何事为先？有德宜积，有福当修。古今□相□门……

（中缺数字）辟土以来，创立黄姚，即立斯庙，名之曰安乐。美哉！是祠今见历年久远，内外颓坏。众沐 神恩浩大。诸乡奋然兴思，重修竖造，一人□念，各各咸从，化动善信，无不欣欣喜而乐助者也。兹者修饰华彩焕光。神灵益加显赫，则士农工商人人锡之厚禄厚福矣。迄今工完业就，顶戴威灵，铭刻资财，永垂不朽□典于万万年矣。是以为序。

缘首

吴正星 孟元春 周际昌 孟魁春 邓柏荣 李荣春 会首林文修

各一两六钱

会首

黄朝彦 吴嘉茂 马瑞阁 古必凤 劳朝客 各五钱

信生

苏元睿 四钱

孟先春 吴嘉兆 三钱

信士

劳祥机 三钱三

吴京昌 李黄孙 三钱

……（下略）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岁中，冬月二十日谷旦立^①

将此碑与前面提到的天运年碑文作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黄姚街从顺治十年至康熙四十三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街内公共权力的中心，其实不再仅仅是由土人集资兴修，而是“士农工商”集资修建，街内民众的构成生了重大变化。如果将此碑与天运年间的碑以及乾隆以后的碑文作对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情形：乾隆以后的姓氏构成基本与今日情形基本相同，天运碑中则与现今情形有较大差异，而康熙碑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其展现了街内民众从康熙至乾隆年间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清以后，华南地区长距离贸易的发展导致了区域经济，而区域经济又促使了市场体系的重整，黄姚街从村落逐步变为市场中心地。市场格局的变动对黄姚街社会变化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过程中，大量客人沿西江溯江而上，聚集在市场中心地。乾隆《昭平县志》记载道：

昭平僻居偏隅，犷獠杂处。地当冲要，土客丛杂。^②

从上引材料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府江中游地区在清代以后社会构成所出现的变化。而黄姚街的乡绅林作楫在论及宁化里时更是明确指出：

宁化里民僮杂处，僮为土著，余皆来自粤东。^③

这些从粤东迁徙至凝化里的客人即主要聚集在黄姚街。至康熙后期，这些客人在地方社会的经济实力开始不断上升并向安乐祠捐钱，由此逐渐改变了安乐祠的性质。安乐祠的功能不再是划分土、客身份，而在于肯定顺治至康熙四十三年黄姚街社区变动的结果。今天黄姚街内民众对于自身的空间有两种称谓：“寨”和“街”。这两种称谓实际上很微妙地揭示了黄姚街从明而清空间性质的改变。在了解到黄姚街其它祠观在明末至康熙中期之前都处于倾颓状态的前提下^④，我们不难明白，安乐祠是这一时期整个黄姚街公共权力中心，其实质上起到了整合土民与客人的功能。再从题名情况看，安乐祠已经拥有了自身的组织——“会”，而会首正是乾隆年间协助陆焯纂修县志的举人林作楫的先人林文修。客人向安乐祠捐款的原因，笔者猜测可能与入籍有着密切的联系。

^① 《重修安乐祠碑记》，碑存黄姚街安乐祠内。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4。

^③ 乾隆《昭平县志》卷4。

^④ 黄姚各祠观的清代重修碑文中均有明清鼎革之际倾颓的记载。

在安乐祠改变的同时，李道清的信仰也开始发生改变。文章第三部分已提到，乾隆年间黄姚街乡绅在讲述李道清故事时，已经没有了万历的背景，李道清变成了在清初社会动荡情况下平定地方的千户。这一故事实际上非常明显地具有虚构色彩。昭平地方是到康熙三十年才归入清政府的统治。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不可能有千户一职的称谓。对于李道清故事变化的原因我们并不难把握，黄姚街民众将李道清土司身份隐去及将其变为顺治时期的人，表明黄姚街在政治上不再从属于水岩村的土司。将明末清初作为一个时间点存在于社区记忆之中，是黄姚街居民构成改变后对文化的重新表述。

在此基础上，我们注意到，这一故事被写进了乾隆的县志。翻阅乾隆《昭平县志》的序，我们不难发现，时陆焯到任昭平知县不久，即在昭平各乡里的乡绅的协助下重修《昭平县志》。参修乡绅都为当时各里的名门望族，其不但捐款资助，更是乐于提供典故旧闻。其中陆焯亦向黄姚街乡绅林作楫等人采集了许多故事。^①显然，街其内乡绅望族在这一时期透过与官府配合修志，牢牢掌握了地方社会的文化话语权。从万历到清初的表述，表明了街内乡绅在崛起的过程中力图透过文化的再表述以确立自身在地方社会的领导地位。

黄姚街乡绅协修县志，是其积极投入到科举制度的结果。康熙四十三年年的安乐祠重修碑文没有记载会首林文修拥有功名，但至林作楫的父亲林廷干，已开始拥有功名。乾隆《昭平县志》如下记载：

林廷干，廩生，宁化里人。博学，能文章，尤工音韵，为诸生试，辄冠军。

生平好诱掖后进，时宁文招三里人鲜知学，干振臂疾呼而士之，出其门者皆

彬彬有文雅风，旧俗为之一变。穿岩，讲学处也。^②

文中提到的穿岩，即樟木林的读书岩。显然，林廷干已经开始积极地透过在各乡里讲学，提高自身在地方社会上的地位。至乾隆二十年左右，其儿子林作楫更是成为了在地方社会上颇有名望的乡绅。林家的崛起与经商有着密切的联系。林家后人今日在追溯其家族发家史时，仍称是祖先是经商起家。^③现在在宝珠观内仍保存着林作楫为其家族客店题写的“喫口茶”匾。这些不同的材料多少可以告诉

^① 参见乾隆《昭平县志》，《姓氏》。

^② 乾隆《昭平县志》，卷7。

^③ 根据对黄姚街林继松老人的访谈笔记整理。

我们，黄姚街在盆地内的市场中心地位是街内乡绅势力崛起的前提，而这些乡绅极有可能就是在清初到黄姚街经商之人。正是在林作楫时期，黄姚街各姓乡绅的经济实力迅速壮大并开始控制宝珠观及临近地区。现今宝珠观戏台上林作楫题写的横匾“可以兴”，清楚表明了其领导的地位。在此背景下，黄姚街内乡绅的势力开始崛起，首先控制了黄姚街的信仰中心，进而控制宝珠观，取代了黄竹黎氏成为了黄姚地区的领导力量。

黄姚街乡绅崛起的情况在乾隆二十四年《昭平县志》修撰的过程中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知县陆焯在序言中对纂修康熙三十年《昭平县志》的杨燮大加批评：

杨志悉抄柯本，不过割裂其条目，离合其章法，增入人物、烈女八、九条，自己诗歌八、九首而已。更可笑者。凡例八条亦抄柯本，志内一条二十四冲出户之说，起于当事者误传，遂烦两台道府区处，而本县为之拮据尽心焉。此盖因僮奸韦公信等侵占民人王承聘等田亩，虽叩阍结案在崇祯二十四年，而起□在万历二十四年，故有此说。至杨公修志在柯公七十余年之后，岂又有二十四冲出户之事？！烦本县尽心乎！^①

陆焯在批评杨燮的背后，实质上是否定康熙《昭平县志》中所勾画的社会秩序。而这一社会秩序的核心，正是围绕着僮人出户之说。到任不久的陆焯在未熟知当地情况的情况下就做出如此的判断，恐怕其中原因还是在于协修方志的地方乡绅。从康熙三十年到乾隆二十四年，昭平地区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异地到此经商的客人，在获得大量田产、经济地位提升的同时，一方面创建宗族，构建“广东人”身份，另外一方面则积极投入到科举制度中，与官府建立密切的联系，以此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并确立自身在地方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地位。至乾隆二十四年时，他们更是需要透过县志的改写使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合法化。乾隆县志的最大特点，就是严格区分汉人与僮人之间的差异。如林作楫在其中写道：

宁化里民獠杂处，民居其二，獠居其一焉。固无獠人与苗人、狼人也。

獠之多者，惟宁化里西以及东西二坪及恩来里九冲则獠獠杂处…而族之分

^① 乾隆《昭平县志》，《序》。

类，有于三月三日具牲醴，供乌米饭，延请师巫红袍执笏以祭神于庙者，名大獐；而四月八日举者则为小獐……^①

文化的创造与黄姚历史的发展互相呼应，正是基于乡绅对确立其社会地位的需要。当时黄姚街内捐款的名单除了林作楫外，还有古天祐、劳显绪、梁九贵、黄廷举、吴润谱等人。^②同时，《县志》在提及地方社会时，亦用“诸姓氏族”^③来加以描述。这就是说，今天黄姚街内的大族格局在乾隆二十四年基本形成。需要指出的是，上面提及的古天祐为黄姚古家的先祖，乾隆《昭平县志》如是记载：

古天祐，黄姚人。力学笃行，恬淡人也。少与增城湛甘泉友善，后湛贵荐于朝廷，力辞。仅叨恩归而终老林泉淡汝也。湛益重之，欲为之建华夏，固辞弗许，止受一椽，资吟咏而已。湛赠诗词甚多。^④

材料中所述无疑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但重要的是，古姓在追溯其先祖的事迹时，是透过标榜古天祐与湛若水的关系以塑造其家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同时，明代人古天祐的名字出现在捐款中，意味古天祐是户名，文章一开始所提及的古姓中最强的天佑公支在这个时候已经形成。

在清初以后迁居黄姚的客人有莫姓的鼎元公支、古姓的天佑公支、郭姓、林姓、梁姓。客人的到来，改变了黄姚社区的基本格局。一方面，原先的许多居民，如伍、宋等姓开始搬离黄姚。而另外留下来的居民，如麦、劳、吴、莫（非鼎元公支）、古（非天佑公支）则开始重新修谱，追溯他们的祖先为万历平乱迁居至此，同时入籍考试，创建宗族（除麦姓以外）。因此，乾隆以后的黄姚街，实际上由两部分居民组成，一是明代平乱后领种的军户，一是清初迁居至此的客人。

黄姚街内乡绅崛起之后，积极参与乡里的公共事务，不断提升其在乡里的社会地位。如乾隆五十五年莫家贡生家成在修路碑中如是写道：

黄姚山环水绕，人烟辐辏，桥梁道路之□缺者，无不修理筑□，惟准提阁左一路独缺焉未理。虽非羊肠鸟□，然当夏雨淋漓，行者有颠蹶之忧。国

^① 乾隆《昭平县志》，卷7。

^② 乾隆《昭平县志》，《姓氏》。

^③ 乾隆《昭平县志》卷4。

^④ 乾隆《昭平县志》，卷7。

学先严有志未逮，适今春为 母上寿，乘歌台、剧梨园以酬戚友。裂锦环顾，斯路果皆倾侧泥泞，难跨步焉。因 先严有念，不觉慨然陨涕，遂命匠断山滑，夷险阻。使侧者正，险者平，荡荡乎如由九陌之道、四达之途。虽□蹈扬鞭阿，□又奚□□焉。□非敢侈言修千万人从往之路，亦以成先人未成之志也。云尔工竣，敬叙片语以志不忘。

贡生莫家成谨撰

乾隆五十五年 岁次 庚戌 仲春月立^①

从“先严有志未逮”到后人“成先人未成之志”，折射的是莫家崛起后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黄姚街七大家族势力的兴起后，取代了黄竹黎姓，积极参与官府赋役征收方面的事务。其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在乾隆以后，从宁、文、招三里经接米岭通往县城道路的修凿，不再是黄竹黎姓捐修，而是由街内各姓乡绅与官府联合倡修。如《道光乙巳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大路碑》中就记载了比林家稍后兴起的莫氏与官府联合倡修的情况，兹摘抄如下：

道光乙巳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大路碑

龙平，岩邑也。所属地方多崇山峻岭，其最险而尤著者莫过于土名接米岭，在邑之东南方，离城百里有奇。其岭绵亘数十里，深谷高崖，羊肠鸟道，车不得方轨，马不能纵驰纵，杖策优游，犹刻刻凛临深履之虞，而况其为负荷往返者，且地当孔道，为凝、文、招、见龙二伍各都里赴邑郡趋省城必由之路。余昔年钦奉简命来宰斯土，因见公亲历险途，目击征夫困苦，行旅艰难。久欲劝捐修治，以便行人，嗣蒙大府以异最特疏题荐，奉旨入覲，枫宸有志。未逮后重莅兹土，而岭道险危如故，康庄未辟，岂天险之难平欤？抑亦人工之未尽也。余极欲平此险途，以稍尽利济之心。适绅士莫霭然等稟请劝捐，与余同志。但虑工繁费，巨力难支，是以捐廉□助，而外与绅民等公议，发

^① 碑文存于黄姚宝珠观内。

薄劝捐。幸所属士民踊跃同心，乐襄善举，或舍仁浆，或馈义粟，有采花酿蜜之资，集腋成裘之美。当即谕令绅民等公举督理之人，觅工雇匠，相度险夷，画定绳尺，卜吉兴工，其修治之处始自黄姚马鞍岭以迄，西坪而止，阅数寒暑而巨功告成。绅民等稟请踏看新路，共庆落成。余公愤命驾往视，但见从前鸟道羊肠尽辟康庄，可以联骑并驾。斯不独杖策优游者行所无事。即等不远千里走稟，请余序其巔末，以垂不朽。余既喜绅民等之乐善急公以将来劝，且喜此岭之易险为夷以万世利微。绅民之请余且不能无言，况远趋稟请，余不禁有乐乎其言之。是为序。

诰授奉政大夫现任广西庆远府同知，前知昭平县事徐士珩谨撰

特授庆远府分府前知昭平县正堂加五级纪录五次徐 捐工舍钱貳百千文正

例授儒林郎吏部侯选直隶州分州莫蔼然捐工金钱壹百千文正

痒生莫泰然偕弟坦然捐钱陆拾千文正^①

除了捐修道路以后，黄姚街内的各姓乡绅还透过建立社仓、社学等机构，确立了其在宁、文、招三里的领导地位。如民国县志记载：

查黄姚民设社仓，共积谷三百一十三石二斗五升并无仓廩，系文、宁二里头人分听系盘查贮，不入奏销。^②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材料中所提的黄姚社仓实际上就位于仙山公祠内。^③在乾隆以后所形成的社会格局大体上延续至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土改运动。

七、结语

将黄姚街置于万历至乾隆年间府江流域社会变迁的脉络下加以观察，我们看到了一个位处“要冲之地”的社区在从军事平定至商贸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人群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如何借助相应的文化标签塑造自身的社会地位。在处理中国社会史的宗族问题时，研究者并不应满足于将其看作是对国家统治秩序构建

^① 《道光乙巳年兴修接米岭并鞍西□大路碑》，碑存黄姚宝珠观内。

^② 民国《昭平县志》卷 2，《中国方志丛书》第 1390 册，成文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9 页。

^③ 社仓毁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土改运动。

下的文化表述，还应进一步辨别同一社区内不同祖先故事之间的差异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地方社会秩序化的历史过程。在黄姚街社区内，所有的大族、乡绅都透过广东移民故事的表述与分享达到控制周边乡村的目的。但在大族之间，迁徙时间、来源表述的不同凸显了彼此间权力与地位的差异。黄姚街民众关于万历与清初的不同移民故事，折射的是明代土民（即军户）与清代客人在明清时期府江流域历史变革中被标签化与秩序化的过程。府江僮乱后土司制度的构建、清代客人进入后市场与社会格局的重组，在历史变革的过程中碎片化地存留于黄姚街内民众的生活之中。只有历时性地讨论乡村社区的大族格局时，我们才能理解地方性的知识体系如何包含着累叠的历史文化过程，空间文化格局的纬度又如何凸显出时间的深度。

（本文收入吴滔、于薇、谢湜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5—233页。）